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学术出版路径探索

——以“技术经济文库”为例

郝 静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 100054）

摘要：当前，知识生产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一双重背景下，学术出版不能再满足于被动承接书稿、完成编校流程的传统角色，而应主动介入知识生产的前端，与学术共同体协同发力，成为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目标-结构-流程-资源”四维分析框架，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策划的“技术经济文库”为研究对象，系统剖析了该文库在策划组稿、编审加工及营销推广等环节的全流程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技术经济文库”探索出一种学术共同体协同出版的模式：目标协同层面，双方围绕学科发展需求形成共同愿景；结构协同层面，联合编委会与规范化评审机制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流程协同层面，双重把关与常态化沟通实现了质量控制；资源协同层面，学术网络与出版渠道的整合拓展了传播效能。这一模式使文库超越了单本著作的简单集合，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制度化合作与优势互补，折射出学术出版从知识记录走向知识建构的角色转型可能，为出版机构参与学科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协同治理；学术出版；自主知识体系；技术经济文库；出版路径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1－0089－07

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学术出版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长期以来，学术出版以被动地接收书稿、按部就班地完成编辑校对流程为主。这种“末端承接”式的定位，既难以有效回应学科发展的整体需求，也很难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给学术出版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出版机构应当从知识传播的末端走向知识生产的前端，与学术共同体（如学会）携手合作，成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推动出版机构与学术共同体形成更紧密的制度化合作，让出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实践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学界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也有基于动态契约治理的规范分析，还有从知识共生、社群嵌入等视角进行的理论建构。在研究结论上，侯波和高虹[1]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学术不端“四维协同治理模型”，揭示了多元主体在学术诚信建设中的协同机制；周洪波和赵春燕[2]以出版社办刊模式为研究对象，指出“学界提供知识生产引擎、出版社提供知识转化枢纽”是协同治理在出版领域成功运作的关键；王鹏涛[3]从人工智能时代学术出版伦理的视角出发，基于动态契约治理理论探讨了韧性构建问题；朱瑾和刘文政[4]提出“知识共生”概念，探讨了社群嵌入的在线平台图书生态重构；许学国等[5]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了四维协同演化模型，探讨了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知识治理绩效的组态路径；石磊[6]从知识生产视域出发，探讨了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融合创新的路径选择；张文祥[7]系统研究了网络信息内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研究为理解出版工作如何服务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多聚焦于期刊出版或网络治理领域，对学术图书出版尤其是丛书或文库形态的协同治理研究还比较少。

基于此，现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的大型学术出版工程“技术经济文库”为研究对象，从目标、结构、流程、资源4个维度考察学术共同体协同模式下的出版实践，试图回答

收稿日期：2026-03-31

作者简介：郝静（1981—），女，湖南长沙人，硕士，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出版理论与实务。

以下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背景下，学术出版如何实现从“知识记录”向“知识建构”的角色转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这一模式对学术出版的创新发展又能带来哪些启示？

1 协同治理理论在学术出版研究中的适配性

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解学术出版角色转型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视角。这一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释和处理复杂公共事务中多元主体的合作问题。Ansell和Gash[8]将协同治理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与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协商性的正式决策过程”，并指出在复杂任务情境中，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协商与资源共享，能够达成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的目标。Emerson等[9]进一步提出了协同治理的综合框架，认为其有效运作依赖于4个核心要素：目标协同、结构协同、流程协同、资源协同。近年来，学界对协同治理的研究也在持续深入。Torfing等[10]对62项同行评审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梳理出协同治理中冲突产生与管理的6种策略，包括说服性参与策略、结构与制度策略、建设性沟通策略、引导与领导策略、协调与整合策略以及累积学习与共同创造策略，揭示了协同治理从动机形成到动态演进再到冲突解决的完整路径。Centeno[11]则从知识共创视角切入，提出知识条件在协同治理中的认知维度、执行维度、关系维度和情境维度，挑战了将知识仅仅视为“投入/资源”的决定论理解，为探索知识在协同过程中的循环网络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协同治理理论与学术出版路径探索具有高度的适配性。首先，学术出版涉及出版机构、学术共同体（学会）、科研管理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学者等多个主体，其运作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合作行为，符合协同治理的基本前提。其次，学术出版要真正服务于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就必须在目标设定、结构安排、流程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这与协同治理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再次，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的制度化沟通、协商决策、资源共享等机制，为破解当前学术出版中“末端承接”的困境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工具。因此，将协同治理理论引入学术出版研究，构建针对学术出版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目标协同：学科发展的共同愿景与出版定位

协同治理要顺利开展，首先得让参与各方达成共同认可的目标愿景。Ansell和Gash[8]曾指出，明确的目标共识是协同行动的基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互信、促进资源整合。Emerson等[9]也强调，协同治理的起点是参与主体认识到彼此目标的相互依赖性，并愿意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技术经济文库”的案例中，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围绕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命题，形成了高度契合的合作目标。这一目标协同的过程，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意涵与实践逻辑。

2.1 学科发展的时代呼唤：技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机遇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开始，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独特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技术经济”单独列为一章，与农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基础科学等并列，这标志着技术经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正式纳入国家科技发展体系。这一历史性定位，让技术经济学从诞生之初就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独特使命。

不过，长期以来，学科成果大多以零散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形式呈现，缺乏系统性的学术专著支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科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后文简称“学会”）作为学科发展的组织载体，自197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持续推动技术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的深度结合，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组织网络。到了2023年，学会迎来成立45周年，同时也恰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发布60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让学会迫切需要一套能够系统反映学科前沿成果、体现学科理论体系、致敬学科历史源流的出版平台。

2.2 出版机构的前瞻布局：科技与经济融合的专业定位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技术经济分社成立于2019年底，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进入科技、经济主战场”的战略定位，致力于科技与经济融合领域的专业出版。分社成立3年来，与学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合作出版了《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研究》《技术经济与创新》丛书，后者还成功入选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这些前期合作为文库

的系统化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出版社深刻认识到:要真正服务好学科发展,不能只满足于零散项目的合作,而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出版社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作为一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应用学科,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已经从早期的建设项目评价、价值工程,扩展到了创新创业管理、科技政策评估、数字经济、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等广泛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与国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战略高度契合。出版社意识到,系统出版技术经济学科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既是夯实自身内容矩阵的战略需要,更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

2.3　从共同认知到制度承诺:目标协同的形成机制

2023 年 5 月 5 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十二次理事长办公会正式决定,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推出"技术经济文库"。同年 7 月 2 日,双方在成都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文库定位为"反映技术经济学科领域高水平研究成果、体现学科对国家发展贡献"的系统性出版工程。时任学会理事长李平将文库定位为"反映技术经济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研究成果、体现中国技术经济界对国家发展贡献的里程碑式鸿篇巨制"[12]。文库规划 5 年内出版专著 50 部,首辑 10 册已于 2025 年 11 月正式发布。

从协同治理理论来看,这一目标协同并非偶然达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认知-协商-承诺"的制度化过程。首先,双方基于对学科发展需求的共同认知形成了合作意向。学会需要系统性的出版平台来承载学科知识,出版社需要具有学科深度的优质选题来夯实内容矩阵,这种目标的相互依赖性构成了协同的初始动力。其次,通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将各自的需求转化为具体的合作框架。学会的学科建设需求体现为"反映学科前沿成果""致敬学科历史源流",出版社的内容建设需求体现为"形成系统性出版工程""打造品牌影响力",两者在协商中融合成了可操作的出版规划。最后,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把目标共识转化成了制度承诺,明确了各自的权责义务,为后续各环节的协同奠定了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目标协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库以"反映数十年研究成果、呈现新时代探索"为宗旨,将分散的前沿议题如颠覆性创新、新质生产力、数字资产、能源安全等纳入统一的出版框架,实质上是在为技术经济学科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设施。它不仅是一套学术丛书,更是中国技术经济学界在新时代的一次集体学术行动与知识工程实践。正如 Emerson 等[9]所言,协同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形成超越个体目标的共同愿景,让参与主体在合作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建构自身的目标。"技术经济文库"的案例表明,当出版机构的专业定位与学科发展的时代需求形成共振,当知识生产的制度设计与国家战略形成呼应,协同治理的目标协同便能够超越工具性合作,升华为一种具有价值认同的共同事业。

3　结构协同: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与决策机制

协同治理要有效运作,离不开制度化的结构安排作为保障。Ansell 和 Gash[8]指出,清晰的制度设计是协同治理成功的关键,它包括明确的参与规则、决策程序和冲突解决机制。Torfing 等[10]的系统综述也进一步强调,结构与制度策略是应对协同过程中冲突的 6 种核心策略之一,通过建立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为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提供稳定框架。在"技术经济文库"的实践中,双方通过联合设立编辑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及工作专班,构建了一个权责清晰、运行规范的协同决策机制,实现了学术共同体对出版议程的制度化参与。

3.1　顶层设计:复合型编委会的构成逻辑

文库启动之初,双方就联合成立了"技术经济文库"编委会。这一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体现在编委会成员的构成逻辑上:既要考虑学术权威性,也要兼顾出版专业性;既要体现学科覆盖的广度,也要确保决策执行的可操作性。

一方面,由学会理事长担任编委会主任,同时,学会选派学科内的领军人物加入编委会,包括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带头人等。这些学术专家能够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动态,判断选题的学术价值,确保文库内容体现技术经济学科的最新进展和核心成果。另一方面,出版社也派出了副总编辑加入编委会,能够就选题的出版可行性、市场定位、传播效果等提出专业意见。这种复合型结构,使得选题决策既能体现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能兼顾出版规律与传播效率。正如周洪波和赵春燕[2]所言,这种"学界提供知识生产引擎、出版社提供知识转化枢纽"的模式,正是协同治理在出版领域成功运作的关键。

此外,专家顾问委员会由学科内德高望重的资

深学者组成，主要发挥咨询和指导功能，为文库的宏观方向提供学术支持。工作专班则由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出版社项目编辑组成，负责具体推进项目的日常协调。这种“编委会决策-顾问委员会咨询-专班执行”的3层结构，既保证了决策的权威性与科学性，也确保了执行的效率与连贯性。

3.2 评审机制：规范化的选题遴选流程

在选题评审环节，双方共同制定了标准化的评审规则，体现了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在公开透明的规则框架下共同参与决策”的核心特征。

(1)学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选题。通过官网、学术会议、专业委员会等渠道发布征集通知，明确选题要求和申报程序。专著作者需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正式会员。这一门槛设计，既体现了学会对成员的学术服务承诺，也确保了作者群体的专业归属感。同时，出版社也会与学会针对特定专业方向共同策划、定向邀请权威学者撰写作品，以进一步夯实文库的内容矩阵。

(2)实行多轮评审与回避制度。学会组织编委会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初步筛选，对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可行性进行第一轮把关。通过初筛的选题进入现场评审环节，由6～7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集中评审，出版社资深编辑参与，从出版的角度提出专业意见。评审过程实行作者回避制度，确保评审的公正性。评审标准涵盖学术创新性、理论深度、实践价值、与文库定位契合度、出版价值等多个维度，专家根据标准独立打分，综合确定选题是否入选。

(3)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入选选题名单通过学会官网等渠道进行公示，接受学界监督。公示无异议并经编委会和出版社最终确认后，选题方可正式立项。这一公开透明的流程设计，既发挥了学会的学术资源优势，又借助出版社的专业视角对选题质量进行把关，有效规避了单一主体决策可能存在的盲点。

3.3 基础保障：工作专班的常态化协调

除了决策层面的制度设计，文库在基础保障层面也建立了常态化协调机制。工作专班成员定期交流稿件接收情况、反馈项目进度、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具体来说，包括定期统计选题进展、跟踪作者写作进度、了解稿件完成情况；对于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的作者，编辑会及时提供专业建议和支持；涉及选题调整、延期等事项，也会及时与学会沟通协商。这种结构化的协同安排，使学术共同体对出版的参与从偶发性的专家咨询上升为制度化的议程设置与决策参与。出版机构不再是选题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与学术组织共同成为知识生产的策划者与组织者。

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一结构协同有多重价值。①通过明确参与规则和决策程序，降低了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双方无需在每次决策时重新协商规则，而是可以直接依据既定程序推进工作。②通过建立联合决策机制，增强了决策的公信力和认同度。编委会的决策不仅代表出版社的意见，也代表学会的学术判断，更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支持。③通过设立日常协调机制，保障了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工作专班的存在，使双方能够及时沟通信息、解决问题，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合作梗阻。

4 流程协同：多方参与的内容把关与质量控制

在实际操作中，“技术经济文库”建立了一套由出版社和学会共同把关、协同推进的质量控制机制，确保了学术内容的专业性和出版流程的规范性能够有机结合。这种流程层面的协同，回应了协同治理理论对“执行过程中多方参与、信息互通”的要求，也体现了Centeno[11]所强调的知识在协同过程中的认知维度与执行维度。

4.1 双重把关：政治引领与学术评审的有机统一

文库稿件实行双重质量审核机制，将政治质量与学术质量在流程设计中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书稿提交后，首先由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进行初审。初审重点关注政治性、思想性、逻辑性以及文字规范性，确保书稿符合国家出版政策和导向要求，观点表述准确、逻辑结构清晰、语言表达规范。初审通过后，书稿交由学会组织的专家进行学术审读。学术审读聚焦科学性、知识性和学术创新性，评估书稿在理论深度、方法运用、数据分析、结论创新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双方审读意见均通过后，书稿方可正式进入出版流程。如有一方未通过，则退回作者修改并重新审读；修改后仍不达标的，取消入选资格。

这一双重把关机制具有多重制度功能。首先，它实现了不同专业判断的互补。责任编辑对政策导向、语言文字的敏感，与学术专家对学科前沿、理论创新的判断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质量保障闭环。其次，它体现了协同治理的核心精神：让多元主体在关键节点共同参与决策，而不是将某一环节的决策权完全交给单一主体。再次，它也建立

了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作者清楚地了解只有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才能正式出版,从而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兼顾政治规范性与学术创新性。

4.2　常态沟通:贯穿全程的协调机制

对于入选文库的选题,出版社安排专业编辑与作者对接,建立“一对一”的沟通渠道。编辑定期了解作者的写作进度,就写作中遇到的问题给予专业出版建议。在这个过程中,编辑不仅仅是流程的督促者,更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通过与作者的深入交流,帮助作者更好地理解出版规范、把握读者需求、优化内容呈现。

工作专班出版项目负责人则统筹文库整体进度,定期统计稿件到稿情况并反馈至学会。在出版的各个环节,凡涉及作者、学会与出版社三方的事项,均通过及时沟通与协商的方式予以处理。比如,在审稿过程中如果出现分歧意见,工作专班就会组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一起沟通,寻求共识;在出版进度需要调整时,也会及时告知各方并协商新的时间安排。这种贯穿全程的沟通机制,有效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流程梗阻,也是协同治理中“建立互信”的重要途径[9]。

4.3　专业保障:学术出版流程的优化举措

考虑到文库学术性强、专业要求严格,出版社在社内也协调了4～5名编辑校对人员参与文库项目的编加。他们熟悉学术出版规范,具备相关学科背景,在编辑加工方面有丰富经验,为文库的出版质量提供了专业保障。

在技术赋能方面,出版社引入了AI(人工智能)辅助审校工具来核对文稿细节,包括引文核对、数据核查、术语统一等。AI工具的应用提高了审校效率和准确性,存疑的地方则由责任编辑与作者逐一确认,实现了技术赋能与人工把关的有机结合。这种技术赋能模式,与石磊[6]所讨论的“数智赋能与平台构建”路径相呼应,也体现了数字技术如何提升学术出版质量控制的精细化水平。

在视觉呈现方面,为突出文库的整体性与辨识度,双方共同参与了封面设计方案的讨论与遴选。历经五版方案迭代,最终选用兼具科技感与学术品格的蓝色调,书名字样采用金色工艺处理,并辅以学会与文库标识,形成了统一的视觉识别体系。

在印前确认环节,书稿需要经过三审编辑、作者、出版项目负责人签字,并提交学会编委会确认后方可下印。这一程序确保了所有参与主体都对最终版本知情并认可,避免了因沟通遗漏而导致的出版差错。样书送来后,出版项目负责人和编辑需确认样书装帧质量,无误后方可批量印刷。

这一流程设计实际上彰显了协同治理的核心精神:在出版全过程中,使多元主体能够制度化地参与进来,将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融入质量控制的每一个环节。这样一来,出版流程就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编校加工,而是一个多方共同合作、携手推动知识生产与质量提升的过程。

5　资源协同:优势互补的营销推广与渠道整合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资源整合与共享是协同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Emerson等[9]指出,当各方拥有彼此所需的独特资源时,协同的动力和效能都会增强。Centeno[11]则进一步提出,应该超越将知识仅仅视为“投入/资源”的理解,去探索知识在协同过程中的循环网络结构。在“技术经济文库”的营销推广中,双方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基本盘”与“外溢盘”分层推进、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的传播格局,把出版推广工作融入了学术共同体已有的交流网络和活动场域中。

5.1　学术网络赋能:借力学会平台实现精准触达

出版社借助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的学术网络,实现了精准推广。2025年11月8日,“技术经济文库”第一辑(共10册)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第三十二届学术年会上正式发布。这次年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驱动学术研究与出版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主题是“AI驱动学术创作暨‘技术经济文库’出版座谈”。这是学会历史上第一次聚焦出版主题的专场活动,标志着出版议题正式进入了学会的学术议程设置。

该专场设置是双方联合策划、有意为之的结果。通过学会年会的官方平台,文库获得了面向学科核心群体的集中曝光:参会的专家学者、青年研究者、决策咨询人员等,正是文库的核心目标读者。平行论坛搭建了一个“产、学、研、服、用”的高端对话平台,围绕AI驱动学术创作、学术出版变革、学科知识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了“研究-出版-应用”的良性互动。正如王鹏涛[3]指出的,这种基于学术生态系统的协同传播,有助于构建学术出版的韧性机制。

5.2　社群网络嵌入:激活作者的圈层影响力

文库的作者大多是各领域的权威专家或活跃的学术新秀,他们在各自的专业圈子里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行业资源,包括专业社群资源、会议资源、

相关企业资源等。在图书营销过程中，出版社鼓励并支持作者利用微信群、学术会议、企业资源等开展精准推广。

这种基于社群网络的传播模式呈现出多重效应：①圈层渗透效应，作者在专业微信群中分享新书信息、组织线上讨论，能够快速触达同行研究者；②会议关联效应，作者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结合文库成果进行报告，形成“报告-新书-交流”的联动传播；③企业联动效应，部分企业通过直接资助购书、在专业读者群赠阅等方式参与传播，有效扩大了文库的专业影响力。

5.3　分层营销策略：“基本盘”与“外溢盘”协同推进

考虑到文库的专业定位，双方确立了“基本盘”与“外溢盘”分层营销的策略[13]。“基本盘”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决策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技术经济相关领域科研、教育、智库、咨询专业人员，青年学生、企业管理人员以及馆藏单位。这部分读者是文库的核心受众，对学术内容有明确需求，是营销的首要目标。“外溢盘”则是对相关主题有一定兴趣的普通读者，虽然非专业背景，但对技术经济话题保持关注。

针对“基本盘”，营销策略侧重于精准触达和深度渗透，依托学会学术网络和作者社群资源开展定向推广。针对“外溢盘”，则通过媒体宣传、公共平台推广、线上线下活动等方式拓展影响力。这种分层策略，使得有限的营销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既确保了核心受众的有效覆盖，也为文库影响力的持续扩展奠定了基础。

5.4　生态体系建设：从单点推广到系统布局

文库营销还着眼于长远发展，双方就后续资源整合达成了共识，拟探索将文库与AI技术、智慧出版相结合，推动技术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以及成果形成完整的生态体系。具体设想包括：探索AI技术辅助学术创作的可能性，提高研究效率和写作质量；开发数字化的学术资源平台，整合文库内容与相关研究资料；举办常态化的学术出版交流活动，促进研究者和出版者的深入对话；推动文库成果向决策咨询转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从协同治理理论来看，这种资源整合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它突破了传统单向营销的局限，把出版推广工作融入了学术共同体已有的交流网络和活动场域中。专业资源、学术资源和出版资源相互补充、彼此促进，使传播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将“营销”视为工具性环节的理解，而是把传播看作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传播，学术成果被更多研究者接触、引用、讨论，从而真正融入学科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再生产与再创造。

“目标-结构-流程-资源”四维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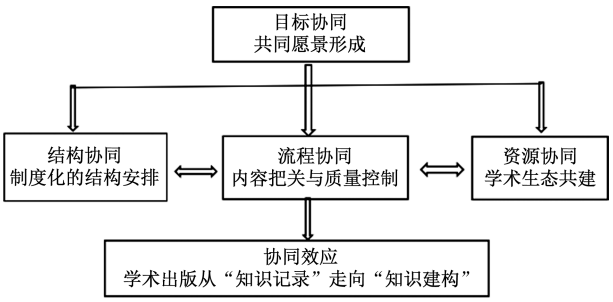


图1　“目标-结构-流程-资源”四维模型

6　结论与讨论

“技术经济文库”的出版实践，为我们理解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学术出版方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文库的成功运作并不是简单延续传统学术出版的模式，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共同目标，通过制度化的合作，进行的一次协同治理的创新尝试。

从理论层面来看，借鉴了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构建了针对学术出版分析的“目标-结构-流程-资源”四维模型，直观呈现了这一分析框架：目标协同是协同治理的起点，强调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愿景；结构协同是制度保障，通过联合决策机制实现学术共同体对出版议程的制度化参与；流程协同是质量控制的关键，通过双重把关与常态化沟通确保学术内容的专业性与规范性；资源协同是效能提升的路径，通过学术网络与出版渠道的整合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4个维度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学术出版协同治理的完整闭环。

从实践层面来看，“技术经济文库”的案例为学术出版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协同创新路径。

(1)主动前移，从知识记录走向知识建构。出版机构应改变被动承接书稿的传统定位，主动介入知识生产的前端，与学术共同体共同策划选题、共同制定标准、共同组织资源，成为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

(2)制度嵌入，从临时合作走向机制化协同。协同治理需要有制度化的结构安排作为保障。出版机构应与学术组织建立联合决策机制、规范评审流程、构建日常协调机制，将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融入出版工作的全过程。

(3)双重把关,从单一审核走向多元共治。质量控制需要多方参与,既要发挥出版机构在政治性、思想性、规范性方面的专业优势,也要借助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创新性、科学性方面的判断能力,形成政治引领与学术评审的有机统一。

(4)资源整合,从单向营销走向生态共建。出版推广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营销思维,而应将出版工作融入学术共同体已有的交流网络和活动场域,通过学术网络赋能、社群网络嵌入、分层营销推进等方式,构建"研究-出版-应用"良性互动的学术生态体系。

协同治理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应用仍有诸多值得深化的议题,如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协同工作效率等。这些问题有待后续实践持续探索与完善。但可以预见的是,在知识生产方式深刻变革、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出版机构主动寻求与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化合作,将会成为学术出版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库的推出标志着中国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化、原创性、高质量学术出版迈入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侯波,高虹. 高校学术期刊介导的学术不端四维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科技与出版,2025,44(9):107-116.

[2] 周洪波,赵春燕. 出版社办刊模式的思考[J]. 语言战略研究,2025,10(6):74-83.

[3] 王鹏涛. 人工智能时代学术出版伦理的韧性构建:基于动态契约治理的视角[J]. 编辑之友,2025(11):21-27.

[4] 朱瑾,刘文政. 知识共生:社群嵌入的在线平台图书生态重构[J]. 中国出版,2025(12):45-51.

[5] 许学国,周诗雨,刘凤梅. 考虑技术势差的创新生态系统知识治理研究[J]. 科研管理,2025,46(1):12-23.

[6] 石磊. 知识生产视域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融合创新进路[J]. 中国出版,2026(4):32-38.

[7] 张文祥. 中国互联网信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8]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 543-571.

[9]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 22(1): 1-29.

[10] TORFING J, PAYANDEH R, JALILI S M,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flict with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Policy & Politics, 2025, 53(3): 1-22.

[11] CENTENO J P. Knowledge conditions in the co-creation of social innovation: a theory-driven review[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25, 57(6): 779-826.

[12]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技术经济文库"第一辑在第三十二届学术年会上正式发布[EB/OL]. (2025-11-10)[2026-02-02]. https://www.cste.org.cn.

[13] 刘隆进,黄丽艳. 打造学术图书出版品牌的思考:以"大学问"为例[J]. 出版广角,2024(S1):56-62.

Explor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Paths from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Library

HAO 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Beijing 10005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aradig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has been elevated to a national strategy. Against this dual backdrop, academic publishing can no longer be confined to its traditional role of passively accepting manuscripts and executing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processes. Instead, it should proactively engage in the front-en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ollaborate synergistically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emerge as a pivotal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systems.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as introduced and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goals, structure,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was constructed. As a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co-planned by the China Society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Library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s full-process operational mechanism spanning from manuscript planning and solicitation to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was systematically dissec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echnology and Economy Library pioneers a model of collaborative publishing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t the level of goal synergy, both parties forge a shared vision centered on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discipline. In terms of structural synergy, the joint editorial board and standardized review mechanisms ensure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process synergy, dual-level quality checks and regular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underpin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For resource synergy,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networks and publishing channels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he mere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works is transcended by this model, by which institutionalized collaboration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re enabled. The potential for academic publishing to transition from a role of knowledge documentation to one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s reflected by it, and thereby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way is provided for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to participate i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cademic publish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echnology and Economy Library; publishing path